

突厥语族文献概论

张铁山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古籍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突厥语族是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之一, 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占据重要地位。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在历史上曾使用过古代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婆罗米文、叙利亚文、察合台文等文字, 并用这些文字创作、翻译和记录了大量的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语言、文学、文化的文献。这些文献既是使用突厥语族传统文化的载体, 也是研究突厥语族语言历史的主要语料。

关键词: 突厥语族; 古代突厥文; 回鹘文; 察合台文; 文献

中图分类号: H21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13)01-0046-15

引言

“突厥”最初仅指 6-8 世纪活跃在漠北高原上的古代部族。6 世纪中叶, 建突厥汗国, 其势力逐渐扩大, 成为游牧于漠北高原和西域广大地区的部族或部族联合体。8 世纪中叶突厥汗国灭亡后, 作为古代部族或部族联合体的“突厥”已不复存在。这些部族的语言大体相同, 具有亲缘关系, 于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统称他们为“突厥人”(Turks), 并把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作“突厥斯坦”, 意为“突厥人的地域”。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 在语言上具有亲缘关系的“突厥”逐步形成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国外称吉尔吉斯)、乌孜别克(国外称乌兹别克)、塔塔尔(国外称鞑靼)、土库曼、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几十个的民族。突厥有广狭二义, 广义泛指突厥汗国前后所有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 狭义仅指 6 世纪中叶到 8 世纪中叶在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漠北高原两度建立突厥汗国, 并活跃于中亚的部族。

突厥语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 它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 经过演变, 形成了现代突厥语族的几十种语言或方言。作为语言学术语, 突厥语族语言可简称为“突厥语”。“突厥语”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公元 6-8 世纪游牧于漠北高原的突厥汗国的语言, 即古代突厥碑铭的文献语言。广义指在语言发生学上有亲缘关系的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及其后来各期文献语言和现代几十种语言或方言。现代突厥语族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塞浦路斯、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蒙古及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全世界使用突厥语的总人数超过一亿。现在中国境内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柯尔克孜、撒拉、裕固等七个民族使用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柯尔克孜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和图瓦语等八种突厥语族语言。

使用突厥语族民族历史上曾使用过古代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婆罗米文、叙利亚文、察合

收稿日期: 2013-04-20

作者简介: 张铁山(1960-), 男, 新疆昌吉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突厥语族语言与古籍教学和研究。

台文等文字,并用这些文字创作、翻译和记录了大量的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语言、文学、文化的文献。这些文献既是突厥语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突厥语历史发展的主要依据。下面我们以突厥语民族历史上使用的主要文字为依据,重点概述古代突厥文、回鹘文和察合台文及其文献。

一、古代突厥文及其文献

古代突厥文是突厥语族民族使用于公元7—10世纪的一种音素—音节型文字。从形式上看,因为这种文字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文相似,所以有人称之为古代突厥如尼文;从文字的发现地域来看,其主要碑铭发现于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和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因此也有人称之为鄂尔浑文、叶尼塞文、鄂尔浑—叶尼塞文、西伯利亚文等;从文字的使用时间上看,它主要用于突厥人和回纥人活动于蒙古高原的7—9世纪以及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公元10世纪下半叶)之前,所以有称其为前伊斯兰文;此外,尚有人称它为蓝突厥文。

关于古代突厥文的起源,学术界虽有各种意见,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古代突厥文字母中有除了23个来自阿拉美文以外,还有一些是来自突厥语族民族使用的氏族或部落标志(印记符号)及表意符号。古代突厥文由38—40个符号组成(有些符号有几种不同的写法),其中用四个字母表示八个元音: a、ä、ı、i、o、u、ö、ü;用两个字母表示 k,一个字母表示 g,三个字母表示 q,一个字母表示 γ。b、d、l、n、r、s、t、y 等八个辅音各用软硬两套字母表示。与后元音相拼的辅音称为硬辅音,与前元音相拼的辅音称为软辅音。

目前已发现的古代突厥文文献主要是铭刻文献,其中有碑铭、题记、摩崖石刻、日常用品上的刻文等。此外,还有少量的写本纸质文献。

1. 铭刻文献

《阙特勤碑》 该碑立于今蒙古国和硕柴达木地区科克辛—鄂尔浑河岸,离乌兰巴托400公里。1889年由俄国人H. M. 雅德林采夫发现。石碑立于向东西伸展的长方形场地上。碑额的一面画有可汗图腾,另一面为汉文题词,并有立碑日期——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碑额下的碑面大部分为汉文。另三面以及碑侧全是古代突厥文。碑面刻有40行碑文,其右侧的13行为其续文,另四面磨平的碑侧亦刻有突厥文,共计66行。该碑保留较完整,是古代突厥文碑铭中最重要的“三大碑”之一。

《阙特勤碑》的汉文部分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所撰,内容与突厥文部分无关。突厥文部分为阙特勤之侄药利特勤撰,主要记述第二突厥汗国的建立者阿史那骨啜禄之次子阙特勤的生平事迹和武功。该碑对古代突厥语文及第二突厥汗国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毗伽可汗碑》 古代突厥文和汉文合璧碑铭。突厥文部分为阙特勤之侄子药利特勤所撰。汉文部分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命史官李融撰写,唐玄宗亲笔御书,内容与突厥文部分无关。碑立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1889年俄国雅德林采夫于蒙古国鄂尔浑河流域右岸和硕柴达木湖畔发现。该碑现存于原地。石碑为大理石制成,现倾倒在地,碎成三块。碑呈五棱形,绕以卧龙雕塑。碑额的一面是突厥文题词,其下的主要碑面上刻汉文,已剥蚀磨损。碑额的另一面是可汗图腾,下面的主要碑面为突厥文,计41行,其续文刻在碑的左侧,计15行,碑的右侧另有15行突厥文。碑铭的四周碑侧均刻有突厥文,但保存下来的仅有两面碑侧。该碑主要记述第二突厥汗国的建立者阿史那骨啜禄之长子毗伽可汗的生平事迹和武功。该碑对研究古代突厥语文及第二突厥汗国史具有重要价值。

《噉欲谷碑》 又称《巴颜楚克图碑》。为噉欲谷本人生前于唐开元四年(716)左右撰写,死后约于唐开元八年(720)立于墓前。1897年由克莱门茨夫妇发现于蒙古国土拉河上游右岸与那拉哈驿站之间巴颜楚克图地方。该碑共存突厥文62行,刻在两根插入土中的石柱上。石柱呈矩形。南柱高1.70米,上刻碑文的开头部分(1—36行)。北柱略低,为1.60米,上刻碑文的后半部分(37—62行)。每行自上而下,自左到右书写。碑文主要记述噉欲谷为谋臣时,辅助第二突厥汗国骨啜禄、默啜、毗伽三代可汗的

丰功伟绩。该碑在书法和语言上有一些特点,碑文的风格不如《阙》《毗》二碑庄重,作者多用对话形式,以警句和俗语渲染其叙述,从而使碑文显得动人而自然。

《阙利噶碑》 科特维奇于1912年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伊赫和硕图谷地发现。石碑是用花岗石制成,石碑的四面均刻有碑文,但保存得很不好。北面的碑文已全部风蚀消失,其余几面也已严重剥落,尚可勉强读出的有东面13行,西面12行,南面4行,共计29行。

该碑是东突厥汗国一位重要的显贵——达头酋领阙利噶的墓志铭。碑文列举了阙利噶和中国人、大食、九姓乌护、地豆干、葛逻禄的多次交战,颂扬了他的勇敢和美德。由于该碑破损严重,难于解读,碑文叙述的事件难以连贯起来,但它可以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噶欲谷碑》相互比照,对研究东突厥汗国的历史、地理等具有重要意义。

《磨延噶碑》 又称《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葛勒可汗碑》。该碑约建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1909年由芬兰学者兰司铁在蒙古国北部色楞格河及希乃乌苏湖附近发现。碑文存古代突厥文50行,但破损处较多。主要记述回鹘汗国第二代可汗葛勒可汗(747—759年在位)的生平事迹。该碑保留字数较多,对研究古代突厥语文及回鹘汗国史具有重要价值。

《翁金碑》 约建于唐开元二十七年(739)。1891年由俄国雅德林采夫在蒙古国和硕柴达木南180公里翁金河支流附近发现。碑铭现仍存于原地。内容为后突厥的始波罗达干记录其父伊利伊跌迷失叶护在登利可汗时期的事迹。该碑对研究古代突厥语文及第二突厥汗国史有重要价值。

《九姓回鹘可汗碑》 全称《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又称《保义可汗纪功碑》《哈喇巴喇哈逊碑》,为古代突厥文、汉文、粟特文三体碑铭。立于唐元和九年(814)。1890年发现于蒙古国鄂尔浑河畔的哈喇巴喇哈逊遗址。古代突厥文部分残损过甚,保留的字数不多;粟特文、汉文保存较好,尤其汉文保存完整。主要记述自回鹘汗国建立以来一直到第八代保义可汗历代可汗的事迹,尤其详细记录了摩尼教传入回鹘的情况,为研究古代突厥语文及回鹘汗国历史、宗教的重要材料。

《苏吉碑》 约建于回鹘汗国灭亡(840)后不久。1909年由芬兰学者兰司铁发现于蒙古国北部的苏吉大坂附近。突厥文保留完整,共11行。主要记述黠戛斯人裴罗骨噶禄牙尔干的生平事迹。此碑对研究古代突厥语文及回鹘汗国史有一定的价值。

《塔拉斯碑》 1898年由卡拉乌尔发现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塔拉斯河流域,上刻4行突厥文。立碑年代不详,似属西突厥汗国时期的墓碑。

《铁尔痕碑》 又称《塔里亚特碑》《磨延噶第二碑》,是回鹘格勒可汗的第二个重要碑文。1957年由蒙古考古学家道尔吉苏荣在杭爱山脉西北铁尔痕河谷铁尔痕查淖干尔湖附近发现。该碑已碎为四块,现存于乌兰巴托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碑文刻于四面,共30行,龟座后部尚刻有一行文字。碑文风蚀严重,仅个别字行保存完整。

该碑是回鹘汗国早期碑铭,为磨延噶可汗(745—759)的记功碑。碑文的作者是磨延噶可汗之子毗伽可汗(即后来继位的牟羽可汗),记述磨延噶可汗的丰功伟绩。学者认为该碑建于753—756年。

《塞维列依碑》 1969年发现于蒙古国西南接近于中国甘肃的塞维列依地方。碑文用突厥文和粟特文刻成,各7行,但破损严重。内容迄今未有定论,一说为回鹘牟羽可汗的纪功碑;另一说认为是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西迁甘肃的甘州回鹘第一代英义可汗的纪功碑。

除了上面介绍的几个主要碑铭外,还有许多小碑、摩崖石刻、木杆刻记、日用品上的刻文等。小碑的文句大都很短,多为“呜呼,我将离开我的部落、妻子、儿子、民众,我于……岁时离开了你们”的内容,间或也有谈到本人生平事迹的,可以认为是一种挽歌。在叶尼塞河流域的河谷崖壁上也曾发现内容很短的众多古代突厥文题记。如20世纪初发现于叶尼塞河入口处崖壁上的三行古代突厥文题记,刻写精细,保留完整。前苏联国立米努辛斯克地方志博物馆收藏有两枚中国方孔圆钱,一面上铸有汉字“顺天元宝”,另一面上刻写有古代突厥文,经查,“顺天元宝”系唐代晚期和五代十国时通行货币。在叶尼塞河流域曾发现众多的刻写有古代突厥文的铜镜。这些铜镜均产自中原,有些镜背上还铸有汉文。

2. 写本文献

现存的古代突厥文写本文献很少,主要发现于新疆的吐鲁番、米兰和甘肃的敦煌等地。

《占卜书》20世纪初由斯坦因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册子式,共58叶,由29张纸对折逐叶粘成。纸质厚韧,呈黄褐色。由于长期被使用,写本边缘已起皱。写有文字的共104页。从第5叶反面到第57叶正面为两面书写。最后两页的结尾部分用朱笔书写。每页留有很大的天地,写8-9行,每行8-10个字母不等。有些页中还写有汉字,但与写本内容无关。该书内容由65卦占卜文组成,每卦中描述一种情况,然后以“此为吉”或“此为凶”来占卜。每卦前有一行小圆圈,分成三组,每组由一到四个圆圈组成。这些圆圈应为定卦的排列方式。写本年代及整理者不详。似属于9-10世纪。所用语言一般认为属于古代突厥语n方言,与8世纪东突厥汗国的碑铭语言接近。

《古代突厥格言残篇》原件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共6片,写于废弃的汉文文书之背。残损严重,内容为格言警句,如“凭计谋可捕获狮子,凭蛮力难捉老鼠”;“没有不犯错的智者,没有不迷路的向导”等。对研究古代突厥语言、文学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还有一些写本残片发现于米兰、吐鲁番等地。

关于古代突厥文碑铭最早的科学报道属18世纪上半期,当时引起了西欧学者的极大注意。但那时学界对这种文字并不认识。直到1893年汤姆森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和语文科学会议上介绍自己成功解读古代突厥文的经验,古代突厥文的解读工作已基本解决,“谜”被揭开。继汤姆森成功解读古代突厥文后,拉德洛夫立即着手碑文的翻译工作。除了汤姆森和拉德洛夫的著作外,巴尔托里德、班格、布洛舍、万贝里、瓦西里也夫、加别林茨、德维里亚、科尔什、马迦特、梅里奥兰斯基、沙畹等人对古代突厥文及其碑文发表了许多论著。中国学者在古代突厥文文献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可喜成就,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有份量的论著。

二、回鹘文及其文献

回鹘文是来源于粟特文的一种音素文字,主要流行于9-15世纪。因回鹘人曾广泛地使用过这种文字,所以一般统称为回鹘文。事实上,回鹘文曾被包括回鹘人在内的突厥语族诸民族及一些非突厥语民族使用,是一种跨语言、超方言的文字。它在使用过程中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不仅在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维护突厥语族语言的一致性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也曾对周围其他民族文字有过很大影响。

回鹘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主要使用古代突厥文。后来回鹘社会不断发展,回鹘汗国的势力逐渐壮大,加之摩尼教被回鹘可汗奉为国教,中亚粟特商人日益增多,他们在回鹘汗国的地位也得到加强,粟特文化对汗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九姓回鹘可汗碑》《铁尔浑碑》和《牟羽可汗碑》就是用古代突厥文、粟特文、汉文三种文字写成的。此时的漠北回鹘汗国在继续使用古代突厥文的基础上,开始使用粟特文。

突厥语民族究竟在何时何地开始用粟特文字母记录自己的语言,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根据现存8世纪用粟特文字母铸成的突骑施钱币来看,其最初使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突厥语的可能是以七河流域为主要居住地的突骑施部。对于这一点,地理位置似乎也可以作为旁证,因为突骑施与粟特的主要居住地最为接近。另外,根据20世纪五十年代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浩木地方发现的8行回鹘文碑铭来看,回鹘人早在回鹘西迁(840)以前就已经使用回鹘文了。这说明回鹘文的产生最迟不晚于8世纪。

公元840年回鹘大举西迁后,回鹘文使用得更加广泛,甘州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均使用回鹘文,既用于碑刻,也用于各种内容的写本,元代还用于木刻书中。直到15世纪,回鹘文逐渐被废弃,而代之以察合台文。

回鹘文最初也同粟特文一样,是从右到左横写的。后来因受汉文的影响,改为竖写,字行从左到右。回鹘文在发展过程中,除了对一些不能准确表示回鹘语的字母进行改革以外,还出现了不同的字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鹘文书法艺术。回鹘文字体从形成的手段上分为印刷体和手写体两类。印刷体包括木刻印刷体和木活字印刷体两种。手写体包括楷书体、行书体、草书体三种。另外,手写体还可以根据

书写工具分为软笔体和硬笔体两种。

迄今尚未发现用木活字印刷的回鹘文文献,仅在敦煌发现有千余枚回鹘文木活字。其中最多一次是由伯希和发现于敦煌莫高窟北区第464窟,共计960枚。国内敦煌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等地收藏有近百枚。这些回鹘文木活字是先将硬木锯成高、宽相等,但长度不一的方块,然后用刀在面上刻字而成。

回鹘文木活字虽受汉文活字印刷的影响,但又不完全同于汉文,它充分考虑到了回鹘语是黏着语的特点,汉字为方块字,其活字可以大小高低一致,并且一活字即为一汉字,但回鹘文的一个词(或词干)后可以缀接不同的构词或构形附加成分,因此,其高、宽可以一致,但长短则不一样;一活字有时是一个词,有时只是一个动词词干,有时是一个字母,有时是几个字母组成的音组。

历史上,回鹘文曾对其他民族的文字产生过很大影响,史载“契丹小字”仿自回鹘文;元代回鹘文为蒙古人所采用,经过若干变化后,形成了蒙古文,16世纪以后,满洲人又从蒙古人那里接受了这种字母,形成满文;此外,回鹘文在13-15世纪也用作金帐汗国、帖木耳帝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官方文字。

保留至今的回鹘文文献,内容十分广泛,几乎包罗万象。它是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我们研究回鹘社会历史、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的重要材料。

1. 政治历史类

在回鹘文文献中,至今尚未发现专门的历史著作,只有一些碑铭文献属于这一类。

《乌兰浩木碑》又称《多罗郭德碑》。1955年发现于蒙古国乌布苏省乌兰浩木地方。存文字8行,当为840年以前之碑铭,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回鹘文碑铭。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该碑1962年在甘肃酒泉市发现,现藏酒泉市文化馆。碑原高2.36米,宽约0.91米。后因修城支门洞用,碑被凿解为两部分。碑文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汉文部分共23行,回鹘文部分共32行。此碑立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立碑人为唐兀人善居。

该碑记录了一个唐兀族家族自西夏灭亡之后,至元朝末年150年间六代十三人的官职世袭及其仕事元朝的情况,为我们了解元朝河西走廊地区的唐兀人提供了珍贵史料。碑文的回鹘文部分虽然不如汉文部分完整,但主要内容与汉文部分是一致的,在某些事实的叙述上甚至比汉文部分要详细、具体,可弥补碑文汉文部分之不足。因回鹘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它可以正确地记录地名、人名等,因此,碑文的回鹘文部分还可补汉字注音不准的缺陷,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人名的正确拼音。此外,该碑本身表明,到元朝末期河西走廊一带的唐兀人已使用回鹘语文作为自己的正式书面语文,清楚地反映了回鹘族及其文化在河西走廊一带的深刻影响。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该碑现藏甘肃省武威县文庙石刻室。1933年左右在武威县北30里石峡沟一带出土。现仅存原碑的下半段,高1.8米,宽1.62米,约为全碑的五分之二左右。碑文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汉文部分从上到下通行书写,共36行,每行90字(现存下半截的40字)。回鹘文部分分栏书写(原碑似为十栏),每栏51或52行,现存该碑的后一部分四栏半。此碑可以说是一部历史传记,记载了从巴而术阿而忒亦都护到太平奴诸畏兀儿亦都护的世系传递,是研究元代畏兀儿人历史的重要文献。

《有元重修文殊寺碑》现存甘肃省酒泉市西南约15公里的文殊山石窟。碑高1.24米,宽0.74米,碑额和碑座已失。正面为汉文,散文体,共26行,每行52字。背面为回鹘文,韵文体,也是26行。据此碑汉文部分末尾书“大元泰定三年岁次丙寅八月丁酉朔十五日丙戌上旬喃答失太子立石”,可知此碑立于1326年,立碑人为喃答失太子。该碑对研究河西走廊地区的历史和回鹘文学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还有《土都木萨里修寺碑》《居庸关石刻》《敦煌莫高窟六体文字碑》等碑铭文献。

2. 宗教经典类

现存的回鹘文文献大多属于这一类,其中又以佛教经典文献居多。历史上,回鹘人曾信仰过摩尼教、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并用回鹘文翻译和创作了一大批宗教经典。这类经典文献按其内容又可分为佛教文献、摩尼教文献、景教文献和伊斯兰教文献四小类。

(1) 佛教文献

佛教曾是回鹘人历史上信仰过的主要宗教。早在西迁以前,佛教就可能已经传入回鹘。西迁以后,回鹘人大兴佛教,并受到印度佛教、中亚佛教和中原佛教的东西文化影响,形成了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的回鹘佛教文化,用回鹘文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从目前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来看,既有大乘佛典,也有小乘佛经和秘宗文献,《大藏经》中的经、论两部分的主要著作大都被译成了回鹘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常常加进一些词句或段落,更有再创作之作,从而丰富了这些佛教著作。

《金光明最胜王经》其最完整的本子为一手抄本,1910年由俄国人马洛夫在甘肃酒泉附近的文殊沟所得,现藏原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这一手抄本共397叶。该文献另有两叶为瑞典考古学家伯尔格曼于1927-1935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时在甘肃所得,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此外,德国考古队在新疆发现此经的残卷,现藏柏林德国古代历史和考古学中心研究所吐鲁番写本部。该经的回鹘文译本系古代维吾尔族著名学者、翻译家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根据义净的汉文本翻译的。据目前所知的材料,胜光法师除了该佛经外,还从汉文先后翻译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观身心经》等。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抄写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抄经地点是敦煌。它是目前所发现的时间最晚的回鹘文文献。由于现存的回鹘文文献多为断简残篇,所以这部数量巨大的佛教就显得特别重要,成为研究回鹘佛教的基本材料之一,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世界突厥学家们研究的主要对象。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该文献系译自汉文。译者与《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译者是同一人,均为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该文献国内外均有收藏。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回鹘文文献先后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不少论著。

《阿毗达摩俱舍论》简称《俱舍论》。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日本京都有邻馆、甘肃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等地均存有该回鹘文该残卷。《阿毗达摩俱舍论》为印度佛教大师世宗所著,除回鹘文本外,尚有梵文本、汉文本和藏文本。回鹘文《俱舍论》系译自汉文本,但译者不详。从回鹘文译文来看,译者除有很高的汉文水平和精通佛学外,还懂得梵文。关于翻译年代,学者们认为属于公元14世纪初期到中期。

《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华严经》,在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国的博物馆、图书馆以及中国的甘肃省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均收藏有该经回鹘文残卷。

回鹘文《八十华严经》译自汉文。关于回鹘文译本的译者目前尚无材料证明,但从回鹘文本四十华严译者为安藏来看,八十华严的译者也可能是他。安藏是元代著名维吾尔学者,别失八里人。史称他九岁从师受学,十三岁能背诵俱舍论三十卷,十五岁时已精通儒学和佛教典籍,十九岁时出仕元朝,任翰林学士,译《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等书,1293年去世。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简称《八阳经》。该经是目前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经典,其抄本、刻本残卷在新疆、敦煌等地时有发现,分藏柏林、伦敦、圣彼得堡、日本及北京各地的种类达186种之多。

《阿含经》早期佛教基本经典的汇集,其内容在佛教第一次结集时就被确定,至部派佛教形成的前后被系统整理,约公元前一世纪时写成文字。现北传佛教有《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壹阿含经》四部,称四阿含。此外,尚有《别译杂阿含经》一部。属于《阿含经》的回鹘文写本残卷在国内外均有收藏。

《说心性经》由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千佛洞所得,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编号为Or. 8212-108。该写本为一册子本,内存38叶,为不同佛教文献的集成。《说心性经》即是该册子本的一部,位于2a-16b叶,存405行。

除上述文献外,还有其他一些回鹘文佛经残卷,如《方广大庄严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佛说无量寿经》《胜军王问经》《十方平安经》《般若波罗密多经》《善恶两王子故

事》《俱舍论颂注》《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阿烂弥王本生故事》《俱舍论实义疏》《阿毗达磨顺正理论》《金刚经》《妙法莲花经玄赞》《圆觉经》《吉祥轮律仪》《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圣救度母二十一种礼赞经》《瑜伽师地论》《药师光王佛经》《菩提行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等。从目前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来看,既有大乘佛典,也有小乘佛经和秘宗文献,《大藏经》中的经、论两部分的主要著作大都被译成了回鹘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常常加进一些词句或段落,更有再创作之作,从而丰富了这些佛教著作。它成为研究回鹘语文和佛教的重要依据。

(2) 摩尼教文献

回鹘人早在漠北游牧时期就已接受了摩尼教。西迁以后,摩尼教仍与佛教、景教并存于回鹘,并留有一些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这些文献对了解摩尼教教义和回鹘信仰该教的情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

回鹘文摩尼教文献较为重要者有摩尼教根本教义书《二宗经》、语言古老质朴的《摩尼教忏悔词》(现已发现该文献写本20余件,分别收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圣彼得堡、柏林等地)以及各种摩尼教赞美诗等。《摩尼教忏悔词》包括15项具体忏悔的内容,是了解回鹘摩尼教徒宗教生活的一份很重要的原始材料。各国学者对此文献多有研究。

(3) 景教文献

回鹘人在宋末元初曾信仰过景教,且极盛于元初。保留至今的回鹘文景教文献很少,其中主要有《福音书》《圣乔治殉难记》等。另外《伊索寓言》也曾被译为回鹘文,这与回鹘人信仰景教有关。

(4) 伊斯兰教文献

10世纪下半叶,当新疆历史上著名的喀喇汗王朝时期,伊斯兰教开始传入新疆。随同伊斯兰教的传入,出现了一批伊斯兰教内容的回鹘文文献。其中主要有《帖木耳世系》《升天记》《圣徒传》《心之烛》《幸福书》等。这些文献对于研究伊斯兰教史及其在新疆的最初传播无疑是有重要价值的。

3. 文学作品类

在回鹘文文献中,除了占有相当大比例的宗教经典以外,居于第二位的就要算文学作品了。回鹘文学作品的种类很多,有民歌、诗歌、传说、故事、剧本等,其中既有翻译的作品,也有创作的作品。

《弥勒会见记》到目前为止,在国内收藏的回鹘文文献中,篇幅最大、数量最多的首推《弥勒会见记》(一些学者定名为《弥勒三弥底经》)。该书是一部长达二十七幕的演说佛教教义的原始剧本。它不仅是我国维吾尔族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我国各民族现存最早的剧本,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现存我国的《弥勒会见记》于1959年4月在新疆哈密县天山人民公社脱米尔提大队附近发现(为了区别于流失国外的同名回鹘文残卷,一般称之为哈密本),原件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写本形式为梵夹式,纸质厚硬,呈褐黄色。上下划有浅黑色边线,每行也划有行线。在每叶文字的第七到第九行之间划有黑色圆圈,直径为5公分。圆圈中间有穿绳用的小孔。写本共约293叶(586面),其中完整无缺和大体完好的约114叶。每叶正面左侧用小字写有品数和叶数。写本两面书写。每幕开头标明演出场地的文字,用朱笔书写。

该书是先由一位名叫圣月的佛教大师从印度语译成古代焉耆一龟兹语(即所谓的吐火罗语),后由一位名叫智护的法师从古代焉耆一龟兹语译成突厥语。哈密写本的施主是曲·塔思·依干·都督。写本正文并非由一人抄写。从现存残卷来看,已见有三种不同的字体:一种为书法浑圆、熟练的字体;其次为一种细瘦的楷书;第三为一种略显笨拙的字体。具体抄写人的名字在书中见到的有两个:法尊萨里和土克·促帕·阿凯。除我国收藏以外,德国也藏有一些残叶。这部分残叶是本世纪初由勒柯克率领的德国考察队在我国新疆吐鲁番的木头沟和胜金口等地发现的,共227叶,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其中完整的不过十几张,多为残片。

《乌古斯可汗的传说》 现存唯一回鹘文写本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写本用草体回鹘文写成,

首尾部分残缺。共 21 叶(42 面)。该《传说》是一部散文体英雄史诗。内容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史诗的开头和结尾。这部分反映了关于本族起源和创世的神话以及某些古老的风俗习惯,第二部分主要记述乌古斯可汗的征战活动。《传说》虽为散文体,但一些地方也夹杂有韵文,一些句子明显带有诗韵的因素,具有很强的节奏性。由于《传说》具有重要的民族史、文化史、文学、宗教、语言、民俗学等价值,因此写本被发现后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先后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

《福乐智慧》 公元 11 世纪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用回鹘语写成的一部长诗。该书原本迄今尚未发现,目前仅发现三种手抄本,即维也纳抄本、开罗抄本和费尔干纳抄本,其中维也纳本是用回鹘文抄成的。

维也纳回鹘文抄本是最早发现的一个抄本。1439 年由哈桑·喀喇·沙依勒·谢米斯在赫拉特城用回鹘文抄成(因此又被称作“赫拉特本”)。1474 年发现于伊斯坦布尔。抄本发现时已残缺不全。18 世纪末,在赫拉特供职的奥地利东方学家普尔戈什塔里将该抄本送至维也纳,现存维也纳国立图书馆。1979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耿世民和魏萃一根据阿拉特校勘本翻译的汉文节译本。1984 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集体完成的《福》的拉丁字母标音转写和现代维吾尔语诗体今译本。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办陆续影印出版了三个抄本。1986 年,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郝关中等的《福》汉文全译本。1987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与该院图书馆技术室合作,用电脑编制出了《福乐智慧·词汇索引词典》。

《真理的入门》 现存三种较全的抄本,即撒马尔罕甲本、伊斯坦布尔乙本和伊斯坦布尔丙本。其中撒马尔罕甲本为回鹘文抄本,抄成于 1444 年撒马尔罕城,现存伊斯坦布尔阿亚索非亚图书馆。伊斯坦布尔乙本是一部回鹘文和阿拉伯字母维吾尔文合璧的抄本,抄成于 1480 年,也藏于阿亚索非亚图书馆。

《佛教诗歌集》 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册子式,共 38 叶,其中 1a、17a-33b 为佛教诗歌。每页写 15-17 行。字体为回鹘文草体,文中多处夹写汉字。这些诗歌全都是押头韵的四行诗或八行诗,共约 948 行。

《常啼和法上的故事》 原卷现存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共 30 叶(60 面),册子式,叶数用汉字书写。封面和正文首尾都盖有佛像印记。最后一页和后封面上盖有大型藏文墨印。写本前一部分(1a-21a)共 653 行,为《大般若婆罗蜜多经》中关于常啼和法上二菩萨的故事,与汉文本《放光般若经》中的“萨陀波仑品”和“法上品”内容相似。回鹘文本似译自汉文本,但汉文本为散文体,而回鹘文本则为 181 段押头韵的四行诗形式。因此回鹘文本不是译作,而是再创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观音经相应譬喻谭》 该回鹘文写本 1907 年由斯坦因发现于敦煌,原件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写本共 15 叶,用汉字注明叶码,文中多处夹写汉字。抄写人为吐凯儿·铁木耳。写本为押头韵的四行诗形式,似为古代佛教界在讲说《观音经》之后的唱词,所以在回鹘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4. 经济文书类

现存的回鹘文经济文书很多,且分藏于世界各地。随着各国学者的不断努力,已陆续刊布发表了一部分。其中《高昌馆来文》是最重要的一部。

《高昌馆来文》 又称《高昌馆课》,是明代高昌馆汇编的汉文、回鹘文对照公文集。约成书于成化至嘉靖(1465-1566)年间。共收入文书 89 件,其中新疆各地进贡文书 83 件,请求升职文书 3 件,明皇帝敕文 1 件,边防文书 2 件。其版本很多,主要有明代抄本《高昌馆课》和东洋文库藏本《高昌馆来文》。该公文集先写成汉文,后逐字直译为回鹘文,故未能正确反映出当时畏兀尔人的口语和回鹘文文法的特点,但它对研究新疆各地方政权与明代中央政权在政治、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价值。

我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文管所中也收藏有一批回鹘文经济文书。其中现已刊布和研究定名的文书主要有《阿体卖奴隶(善斌)给买主写的临时字据》《阿体给买主写的正式字据》《买主薛赛大师买到奴隶后写的正式字据》《定慧大师卖奴隶字据》《医者大师义与蔡氏离居字据》《摩尼教寺院文书》《摊

派草料令》等。

5. 语言文字类

在回鹘文文献中,专门的语言文字作品极少。对于研究回鹘语文来说,当然每一部回鹘文文献都是极为重要的,能为我们了解回鹘语文的全貌提供可靠的材料。除此之外,属于语言文字类的回鹘文文献《高昌馆杂字》则是迄今发现的最为重要的资料。

《高昌馆杂字》又名《高昌馆译语》《高昌馆译书》。明代高昌馆编撰的汉文、回鹘文对照分类词汇集。成书于永乐(1403-1424)年间。所收词语分为17个门类,共1000余条,均从高昌、哈密等地朝贡表文中摘出。其版本很多,主要有《高昌馆译书》藏北京图书馆,清刻本,骑缝上印有“高昌馆”三字;《高昌馆杂字》藏北京图书馆,清抄本,朱丝栏,书口上朱印“同文堂”三字(《华夷译语·高昌馆杂字》藏北京图书馆,明抄本,首册封面钤印有“张璪若章”、“玉堂侍御”两章,首页有“御赐三长并擅之斋”、“尊孟阁”、“云中白雀”和“北京图书馆”四印《高昌馆杂字》,日本东洋文库藏本。《高昌馆杂字》不仅是研究明代回鹘文和当时吐鲁番、哈密一带维吾尔语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研究当时汉语语音的重要参考资料。

6. 科学技术类

历史上,处于丝绸之路上的回鹘人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明和传播有过重要贡献。但很可惜的是,目前发现的科学技术类的回鹘文文献很少,仅存一些历法、医学等文献残片,而且大多流失国外。其中21世纪初由德国吐鲁番考古队发现的一本回鹘文医书极为重要。这本医书现存柏林,共有回鹘文201行,首尾两页比较残破。该书内容涉及临床各种症状和病症、药物治疗、疗法以及其材料。它是回鹘人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对我国医学,特别是维吾尔族古代医学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纵观世界各国回鹘文文献研究状况,各国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的刊布和研究工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论著,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学者除了对具体文献进行专门的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论文、专著外,还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回鹘文及其文献的介绍性文章。这些文章对回鹘文知识的普及和学习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察合台文文献

喀喇汗王朝时期,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突厥语族诸民族已开始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并运用于科技和文学创作之中,因而像《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等巨著也有阿拉伯字母文字的抄本传世。但当时这种文字并不普及,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而且回鹘文仍在通行。到察合台汗国时期,随着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传播,这种文字被广泛使用,并因通行于察合台汗国而被称为“察合台文”。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察合台文被广泛用于记录突厥语族语言。现代突厥语族所使用的文字,如现代维吾尔文、现代哈萨克文、现代柯尔克孜文等都是察合台文的延续。察合台文对现代突厥语族的文字产生有巨大影响。

察合台文是阿拉伯字母系统的拼音文字。它采用阿拉伯文的28个字母和其他一些辅助符号,同时又从波斯文中借用了4个字母,一共由32个字母组成。字母分词首、词中、词末、单独等形式,从右往左横书。有的字母专用于拼写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词中的元音往往省略。有个别的双字母及清浊音混用字母,有几个元音用同一个字母表示,或一个字母在不同音节中既表示元音又表示辅音的现象。

目前发现的察合台文文献很多,且分散收藏于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英国大英博物馆、土耳其有关图书馆等地。这些文献在研究新疆和中亚地区各民族,特别是突厥语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下面选择一些重要的察合台文文献分类加以介绍。

1. 历史地理类

《拉失德史》又名《中亚蒙兀尔史》，米尔咱·海答儿1547年完成于克什米尔。作者全名米尔咱·马黑麻·朵豁拉提·古列汗，为明代西域叶尔羌汗国维吾尔人，1499年生于达失干（今中亚塔什干）。曾助其表兄速檀·赛伊德汗统率军队在推翻喀什噶尔政权，建立并扩充叶尔羌汗国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551年去世。作者完成该书，献给了叶尔羌汗国第一代汗王拉失德汗，故名。全书分上下两编，记述了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约200年间新疆和中亚的历史。第一编内容包括自蒙兀儿斯坦政权第一代汗王秃黑鲁帖木儿至叶尔羌汗国第一代汗王速檀·拉失德的全部历史；第二编为作者的回忆录，较详细地记述了15世纪中叶以后新疆及中亚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状况。该书原文为波斯文，后被译成察合台文，皆以抄本传世。

《突厥人世袭》这是一部关于16-17世纪上半叶花刺子模社会政治史的著作，完成于1664年。该书作者是大历史学家、希瓦汗国汗艾布·哈兹（1644-1664年执政）。全书由简短的引言和九章组成。引言谈了写此书的原因。正文九章的内容是从阿丹到合不勒罕；从合不勒罕到成吉思汗；从成吉思汗出生到去世；窝阔台合罕及其统治蒙古本土的后裔；察合台及其统治河中地的后裔；拖雷汗及其统治伊朗的后裔；术赤汗及其统治钦察草原的后裔；昔班尼汗及其统治河中地、西伯利亚、克里木和哈萨克斯坦的后裔；统治花刺子模的昔班的后裔。除这一著作外，作者还写有《土库曼人世系》（完成于1600年）和《赐福人类之书》。该书有许多抄本传世。刊印本主要有1842年喀山石印本、1891年在喀山出版的鞑靼文译本、梅利奥兰斯基根据杰梅宗译本出版的刊印本。该书在完成五、六十年后，即在托博尔斯克发现。后被译成德文、法文、俄文、英文、土耳其文、波斯文等多种文字。

《安宁史》毛拉木沙于1903-1906年著。全书由序言和六章，以1864年新疆发生六城农民反清起义为序言；第一章追述了历史上突厥部落的起源、突厥各时期的可汗、成吉思汗时代及其后代统治时期的事件；第二至六章主要叙述了库车1864年爆发的反清农民暴动，库柯奇和加借机夺取领导权；阿古柏的侵略活动及其独裁统治；清军和新疆各族人民粉碎阿古柏侵略和完成统一新疆的斗争历史；最后还记述有关六城的人口概况、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等。是研究清代后期南疆地区史、民族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有该书的手抄本，203页。

《伊米德史》该书系《安宁史》的作者毛拉木沙对《安宁史》的增补和改写，完成于1906-1908年。全书由前言、第一、二章和结束语组成。前言扼要叙述了突厥部落的形成、突厥可汗、成吉思汗及其后代的事迹。第一章记述了1864年前后新疆各地掀起反清农民起义的原因，特别是库车农民暴动兴起的社会原因及其迅速发展至全疆各地的情况。第二章从阿古柏的出身经历开始，详述了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伙同和卓后裔布素鲁克等借南疆农民起义之机，大举入侵，残酷镇压喀什、英吉沙、和田、库车等地农民暴动，以“六城政权”名义同英、俄建立关系，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向全疆推进，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纳入自己统治范围及其残酷掠夺农民的罪行，阿古柏独裁政权在清军和新疆各族人民共同打击下土崩瓦解和新疆重新统一等重大事件。最后附有六城居民概况、维吾尔族族源等资料，同时还附有作者本人的有关资料。

2. 文学类

《先祖阔尔库特书》是一部英雄史诗集。现有两个抄本存世，其一收藏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图书馆。该抄本封面写有“先祖阔尔库特书”字样，下方写有“乌古斯诸部的语言”。另外一个抄本藏于梵蒂冈的图书馆。该抄本注明“关于喀赞别克及其他人的乌古斯传说故事”。据研究，前一个抄本的语言为克普恰克语，而后一个抄本是以乌古斯语为基础的语言。德累斯顿本包括12个篇章，梵蒂冈本只有6个篇章，但后一抄本与前一抄本的相应各章内容相同。因此，《先祖阔尔库特书》当初有可能是先由讲克普恰克语的人笔诸于文字，后又有人将其译为乌古斯语的，但未能全部翻译完毕。

《先祖阔尔库特书》大约成书于十四、五世纪，其篇名有德尔谢汗其子布哈什汗之歌、萨拉尔·喀赞汗的阿吾勒遭践踏之歌、巴依勃尔其子巴姆瑟·巴依拉克之歌、喀赞别克其子奥拉孜身陷囹圄之歌、乌

古斯·朵哈其子帖勒·托莫尔勒之歌、乌古斯·康里其子坎·吐拉勒之歌、乌古斯·喀则勒克其子伊干涅克之歌、巴萨特铲除独眼巨人之歌、别吉勒其子艾莫列之歌、乌古斯·乌孙其子谢克别克的故事、萨拉尔·喀赞为其子奥拉孜所救之歌、外乌古斯因反叛内乌古斯而诛杀巴依拉克之歌。

这些英雄传说里的主人公并不是阔尔库特本人,而是成就武功的人们。但在这些传说里,每到必要时刻阔尔库特都一定要出场。传说中的阔尔库特是一位可敬的长者、智慧的化身,是通古博今、预知未来的贤哲。他或为年幼的主人公英雄命名,预言他们的前程;或为主人公评说过去,指点未来;或为他们祝福,祈愿他们成就伟业。他本人在这些传说里没有叱咤风云的壮举,却以自己的哲理性言论牵动着故事的发展。他不是这些故事的主角,却把该书12个篇章贯穿成为一个整体。

《先祖阔尔库特书》的最初成型距离阔尔库特生活的时代并不很久远。因此,尽管它被罩上了神话的色彩,却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研究者们认为,该书的内容反映了乌古斯和克普恰克结成联盟,直到这个联盟最终解体的历史背景。传说的人物和事件大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可寻。

《爱情篇》抒情长诗,作者笔名花喇子米。从作者的笔名可知,他是花喇子模人或居住在花喇子模,生活的时代适逢成吉思汗后裔统治下的亚洲大陆正趋于稳定和发展的时代。这时,花喇子模隶属于金帐汗国。从作者诗歌创作的技能和风格来看,他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和较高的艺术造诣。该长诗由序诗、十封爱情书信、献词和尾声组成,其中除第四、八、十一篇中杂有波斯语写成的诗句外,其余均用察合台语写成。其主体部分是一对情侣中的男方对女方用诗歌形式所写的十封情书。其中既有对所爱慕对象的外貌的描绘,也有对情人内在品质的赞颂;既有对爱情的热烈的渴望,也有失恋时的巨大痛苦。作者所歌颂的,不是爱之神,而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男女之间真挚炽热的爱情。这在当时的中亚是非常有价值的主题。目前已知有多种抄本存世。

《五卷诗》一部包括5篇独立成篇的长叙事诗集。作者为阿里希尔·纳瓦依(1441-1501)。纳瓦依生于亦鲁(今阿富汗北部),四岁时入学,聪明过人,能背诵大量波斯诗文。1449年后全家暂逃伊拉克。没有多久,回故乡继续求学,并开始用波斯语和突厥语写诗。1472-1476年,纳瓦依曾一度为官,但他的很多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扶持发展文学艺术的具体办法,限制并打击封建官吏搞分裂的计划,都受到造谣诽谤,因而无法施展他的伟大抱负和宏图,终于被迫辞职。纳瓦依在离开政界后的两三年里(1483-1485年),写出了《五卷诗》。

《五卷诗》包括《正直者的惊愕》《莱丽和曼季依》《帕尔哈提与希琳》《七星图》和《亚历山大的城堡》五部长篇叙事诗。《正直者的惊愕》是一部哲理叙事诗,共64章,7946行。每一章叙述一个问题。诗人以传说和寓言体裁,讲述他对社会、伦理的观点,尖锐地批判暴君、卑鄙的政客、虚伪的宗教人士,揭露内廷生活的荒淫和无耻。诗中利用了许多寓言、民谣、谚语等民间文学材料。诗人的许多诗行,后来以转成了谚语,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莱丽和曼季依》是盛传于中亚一带的关于一对彼此倾心相爱的青年男女恋爱悲剧的故事。共38章,7228行。诗中的男女青年系小时同学,但莱丽的父亲嫌贫爱富,硬把姑娘嫁给了一个富翁。曼季依在极端痛苦中死去。诗人抨击了阻挠自由人性的中世纪恶风陋习,叙述曼季依如何奋起反抗社会,终于被毁灭的悲剧。故事悲壮感人。《帕尔哈提与希琳》共54章,11560行,描写的是一个肯钻研学术和各项技艺的青年帕尔哈提与西琳相恋,非但未能如愿,反招杀身之祸的故事。《七星图》是描写国王巴赫拉姆与内宫美人迪拉拉姆的故事。该诗由七个民间故事改编而成。诗人分别以七个人物,代表七种优美的品质。纳瓦依的《七星图》的故事原本,乃是波斯诗人费道西的《列王记》。《亚历山大的城堡》共89章,14364行,刻画的是一个能与哲人学者共商国事,颇具才干、公正、仁慈的人君形象。

《心之所钟》纳瓦依晚年作品。诗人在作品中总结了他从青年到晚年的人生经验,可以说是他的社会政治观点、道德观念、哲学思想的结晶。作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40章,论述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特点,号召人们主持正义、行善积德,对国王、大臣、各级官吏行贿受贿、阿谀奉承、荒淫奢侈、懒惰行骗、花天酒地,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对劳动人民则表示尊重,认为他们心地善良、地位至尊,希望不管从事

什么职业的人,都要忠于职守,遵守职业道德,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水平,为人民谋利益。第二部分10章,阐述了走歪路的人会得到坏的报应,走正路的人会有好的报应的道理,要求人们应具有忠诚、谦逊、公正的高尚品质和忠实于爱情的道德风貌,对伪善者、贪婪者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第三部分由125个箴言、警句组成,鼓励那些懂道理的人继续进步,唤醒那些一生浑浑沌沌、否定生命价值的人幡然悔悟。

《鸟语》 纳瓦依作于1498-1499年的一部寓言诗。纳瓦依童年曾拜神秘主义作家帕拉丁·阿塔尔(1145-1229)为师,并深受其作品《鸟语》的影响。到了晚年,他回忆童年的往事,模仿帕拉丁·阿塔尔的作品写出了《鸟语》这部著作,但内容与帕拉丁·阿塔尔的不同。

在纳瓦依时代的中亚地区,苏菲主义思潮泛滥。此教派信奉“以今生为虚幻,以来世为永恒,憧憬天国,忘怀人生”的遁世主义哲学,认为人类除了安拉之外不需要任何爱情;如想得到幸福,只要得到创造人类的安拉之爱就行了。因此,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弃现实世界,超脱红尘,清心寡欲,在精神上与安拉同在。作者在《鸟语》中通过一群鸟在戴胜鸟的带领下经过长期艰难的飞行与“魔窟”中的鸟中皇——凤凰幽会的故事,让凤凰、戴胜鸟和普通鸟分别代表上天、苏菲主义者和人,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上天”与“人”的问题上,纳瓦依发表了与苏菲主义者针锋相对的观点。纳瓦依认为,“上天”不在宇宙之外,而存在感性宇宙之中,是代表一切的珍宝,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像苏菲主义者那样超出尘世、饱尝辛苦去寻找“上天”。他批判了苏菲主义者关于经过七个阶段与“上天”共存的谬论,同时借用普通鸟指责戴胜鸟的语言批判了帕拉丁·阿塔尔的思想,规劝“普通鸟”要了解自己、珍惜自己,而不要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盲目地追随“戴胜鸟”去寻找什么“凤凰”。渗透于这部著作中的某些近乎自然神论的观点、重视人的价值的人文主义思想,正是其精华所在,不仅对于了解纳瓦依的世界观,而且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状态,都是极为珍贵的材料。

纳瓦依的著作开拓了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民族文学史上辉煌的“察合台文学时期”,哺育了其后的五百年间的维吾尔文学。数百年来,他的作品是维吾尔族传统教育的必读教科书,也是维吾尔古典音乐套曲“十二木卡姆”配唱的主要歌词,对维吾尔文学、文化、教育、艺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年代的变迁,维吾尔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纳瓦依的作品被当做大学中维吾尔古代文学的代表作。

纳瓦依一生共写了六十三部书、数千首抒情诗和叙事诗,并把这些诗歌谱成曲演唱。他谱曲时,常常由于过度兴奋和激动,竟昏倒在乐谱旁。他创作的《纳瓦依》木卡姆蜚声于世界乐坛,五百年来一直在中亚各族人民中传唱不衰,对中亚、西亚、北非、南欧许多地区的音乐和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从现在维吾尔十二木卡姆的歌词来看,绝大部分用的是纳瓦依的词。

纳瓦依每部著作的抄本都很多,有的甚至超过百本,但是属于比较早期的旧本很少,现流散在世界各地。在中国,这些抄本多藏新疆各地。由于纳瓦依在古典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991年命名为“纳瓦依年。”

《爱情组诗》 察合台文诗歌集。作者阿布都热依木·纳札尔,喀什噶里人,幼年曾在宗教学校受启蒙教育,并开始诗歌创作。1830年,任喀什噶里地方官祖乎尔丁伯克官邸的秘书官。他与同代人艾里毕、孜亚伊、赛布里等人组成一个文学小组,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在《爱情组诗》的总名下,共有25部叙事诗,48000多行。分别归为三大部,第一部《生的食粮》,其中主要是“心明”和“眼睛”两个人的宗教对话录。此外,还收了《东方的太阳》《忌物》以及关于宗教伦理的颂赞传说。第二部《流浪者的故事》,其中包括诗人一生大多数重要作品,计有《什刺子诗人萨迪的奇遇》《身毒公主偷读艳情诗歌受责记》《帕尔哈提—西琳》《莱丽—曼季依》《巴赫兰皇帝与迪拉拉》《麦速德—迪拉拉》《热碧雅—赛丁》《瓦木克—乌祖拉》《四个托钵僧》《古丽尼莎·曼宗》。第三部《五行诗集》,主要仿纳瓦依昔日一度用过的诗体。

纳札尔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取材于广泛流传于中亚的民间故事而写成的悲剧性的爱情叙事诗,如《帕尔哈提—西琳》《莱丽—曼季依》等。作品通过歌颂主人公追求纯洁的爱情,向往自由幸福的理想,

忠贞、勇敢的品格,以及他们无一例外地悲惨结局,深刻地控诉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因此,他的作品有强烈的反封建进步倾向,然而,他的许多作品都表现出过多的悲观伤感情绪,使人读后感到沉闷和压抑。这反映了作者面对现实,虽悲愤万分,但又无可奈何的痛苦矛盾心情。

《爱情与苦难书》又译为《爱情与苦难》。长篇叙事诗。作者赫尔克提。赫尔克提1634年生于喀什疏勒塔孜温区巴合奇村。16岁入喀什经文学院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30岁时,曾在阿帕克·和卓的宫廷担任过园丁、灯司、御厨等一些不太重要的职务。37岁时即1670年,完成了长篇叙事诗《爱情与苦难书》。卒于1724年。

《爱情与苦难书》共27章,2070余行。叙述了晨风如何为夜莺和玫瑰的爱情,奔波其间,穿针引线,讲故事。作者在第一章里以“爱情”一词发出一通幽默风趣的议论。第二、三章记述夜莺与玫瑰初见,晨风在万花园中穿行的故事。从第五至二十六章,都写晨风、夜莺、玫瑰三方的对话,特别是五、六、七章的对答,生动活泼,富有戏剧性。第二十七章是尾声,系统地论述了爱情、政治、统治者与人民,以及许多事物的辩证关系。

3. 语言文字类

《突厥语大词典》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古代突厥语词典。其编纂者是马赫木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于1072-1077年间在巴格达完成,后来竟失落达几百年之久,直到1914年土耳其学者阿里·艾米里才在旧书店里偶然发现了它的抄本。该抄本是《词典》现存唯一的本子,由波斯萨微地方人穆罕默德·本·阿巴克克尔于1265-1266年间据原本抄成,现藏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家图书馆。

《词典》用阿拉伯文编写而成。全书共三卷,前后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序论”,叙述了编纂《词典》的缘起,词条的编排体例,文字结构,突厥诸部的地理分布及诸突厥语的特点,并附有一幅圆形地图,标明突厥各部的地理位置。第二部分是突厥语词语的注释。它共收突厥语词6862条,每个词条后有阿拉伯语的注释,并引用当时突厥语诸部的民间诗歌、谚语材料作为范例。

《词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研究古代突厥诸部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是一部有关突厥语族历史与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为此,世界各国对《词典》非常重视,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915-1917年里法特将其翻译成土耳其文,分三卷出版;1928年,德国学者卡尔·布洛克曼按德文字母顺序编排了《词典》索引;1939-1941年阿塔拉依又出版了三卷本土土耳其文译本及手抄本的影印件,1943年出版了《词典》索引;1960-1963年塔什干出版了萨利赫·穆塔里波夫的乌兹别克文译本;1982-1985年,美国学者丹柯夫出版了英文版;1981-198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维吾尔文版;2002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汉文版。

《库曼语汇编》用古哥特文字母写成的库曼语辞书手稿。“库曼”是欧洲人如拜占庭编年史和拉丁文文献的作者们对操突厥语的克普恰克人的称呼,汉文史籍中则写作“钦察”。从11世纪末,克普恰克人已成为从第聂伯河到伏尔加河以东这一片广阔的南俄草原以及克普恰克草原的主宰。13-14世纪,从多瑙河到准噶尔盆地的广阔地域内,居民大多通晓克普恰克语。当时,到过东方的欧洲人认为,要到中亚细亚、小亚细亚等地区,必须通晓库曼(克普恰克语)。为了和克普恰克人进行交流和商业上的需要,欧洲人于1303年在克里米亚的苏达克城编纂了这部《库曼语汇编》。

该书原手稿现藏意大利威尼斯的圣玛克教堂图书馆。全书164页,两面书写。首页标有“1303年7月11日”字样,但手稿作者、具体写作地点不详。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即手稿的前110页,是拉丁语—波斯语—库曼语三种语言词汇对照,附有词汇分类。后一部分即第111页至164页是宗教内容,包括福音书节录的译文,有关耶稣基督、圣母玛丽娅、圣徒传说的注释,有关基督教教义的种种说教。《库曼语汇编》的多数词语译成了古代德语,有的则译成了拉丁语。此外,该书还包括用拉丁文写的“库曼语”语法概要和范例,其中涉及到一些短语、日常用语、熟语、俗语、谜语等等。《库曼语汇编》是研究古代克普恰克语、哈萨克语历史发展的重要文献之一。作为一部解释性的辞书,其中也收录了一些古代的故事传说、民间俗语等材料,对于研究哈萨克民间文学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体清文鉴》 五种文字对照的分类辞书,约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该辞书的文字排列顺序是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其中藏文的下面有两种满文注音:一种是切音,即逐个字母的对译;一种是对音,即实际发音。维吾尔文下面也有满文对音。因此,《五体清文鉴》每页分8栏:第一栏为满文;第二栏为藏文;第三栏为藏文的满文切音;第四栏为藏文的满文对音;第五栏为蒙古文;第六栏为维吾尔文;第七栏为维吾尔文的满文对音;第八栏为汉文。

《五体清文鉴》共6函36册2563页,收词18000条。词条按部、类、则划分,共52部,276类,522则。该辞书是在《四体清文鉴》的基础上增加维吾尔文材料编译而成的,其内容丰富,既有历史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特别是维吾尔文部分更为珍贵。1957年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该辞书。

4. 宗教类

《古兰经注释》 现存六种抄本。第一,由穆合买德·伊本·哈吉·道拉特沙赫于回历734年(1333-1334)在伊朗的设拉子用精美的阿拉伯文字抄写。抄本现存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突厥和伊斯兰著作博物馆。全抄本共902页,每页9行,内容完整。从该抄本整部经文的语言来看,有明显的差别。抄本的第70-108页的语言,属14世纪突厥语。这一点可充分证明原译稿有部分不全或丢失,所补部分的语言与前后文的语言有时间差距。此抄本属直译本类型。在阿拉伯文下,突厥语部分用红色墨水按原文逐字译写其下面。由于译者当时力求忠实于原文,故将阿拉伯原文中的短语等也都一一直接译出来,结果必然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读者脱离阿拉伯原文或不懂阿拉伯语则难以理解突厥语译文内容。第二,现存英国曼彻斯特的约翰·赖兰图书馆。此抄本共14卷,每页3行。抄本亦属直译类型,但内容不如第一种抄本完整,缺少有一半之多。此抄本的特点是除阿拉伯原文、突厥语译文外,在这两种文字之间,还有波斯文译文。据专家研究,突厥语译文部分有四种情况:其一,与阿拉伯原文、波斯译文均完全相符;其二,与阿拉伯原文相符,与波斯译文不符;其三,与波斯译文相符,与阿拉伯原文不符;其四,与阿拉伯原文和波斯译文均不符。抄本中的阿拉伯文用大号苏鲁斯体抄写,波斯文和突厥语译文用小号纳色赫字体抄写。第三,现藏乌兹别克克斯坦塔什干市的乌兹别克科学院图书馆。抄本中也包括波斯语和突厥语译文。突厥语译文的语言较前两抄本稍晚,属13世纪喀喇汗王朝语言。第四,现藏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苏来曼图书馆。此抄本内容完整,语言则为花喇子模突厥语,即属于14世纪的文学语言。抄本上所注明的抄写日期为回历764年(1363),但未注明抄写人和抄写地点。第五,1914年发现于乌兹别克克斯坦卡尔希市,现藏圣彼得堡市亚洲人民研究所。与上述几种抄本不同的是,此抄本除在阿拉伯原文下写有逐字直译的突厥语译文外,按每章内容,还附有若干注释和故事性说明。抄本上未注明抄写人、抄写时间和抄写地点。抄本中逐字直译的突厥语为喀喇汗王朝突厥语,但注释和故事性说明所使用的是花喇子模突厥语。有些学者据此推测,此抄本问世的时间最早也不超过15世纪。第六,带注释的多卷本。语言属察合台语,成书于16世纪上半叶的河中地区。此外,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切斯特白提图书馆还藏有两份残卷。据研究,这两份残卷正是赖兰藏本的残缺部分。

《古兰经注释》的中古突厥语译本,大约都出自12-16世纪。6种不同的抄本是在不同的时间内为居住在不同地区的操突厥语方言的人所译。因此,这些抄本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方言差别。从类型上看,6种抄本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用不同文字,如阿拉伯原文、波斯语译文、中古突厥语译文的隔行对照本;第二种是带有注释和故事性说明的直译本。

5. 译著类

《卡里莱与笛木乃》 原为印度学者毕德帕依献给国王达比希里木的一部文学作品,本名《五卷书》,大约成书于公元4世纪。公元6世纪波斯人白尔才外从印度得到这本书,将其译成波斯文。大约在公元750年,阿拉伯学者阿木杜拉·伊本·穆加法又根据波斯文译本,将其译成阿拉伯文,而且增加了许多内容。到12世纪,纳斯如拉·穆罕默德又根据阿拉伯文本译成波斯文。

察合台文本《卡里莱与笛木乃》的译者是毛拉穆罕默德·铁木耳。译者生卒年不详,喀什噶里人。1717年根据喀什噶里阿奇木伯克伊玛目穆罕默德的建议在喀什噶里译成。有多种抄本传世,对后世突

厥语族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毛拉穆罕默德·铁木耳除《卡里莱与笛木乃》外,还翻译过《美德篇》《安瓦尔苏海里》等。《美德篇》是侯赛因·卡西赫 1779-1781 年用波斯文写成的一部伦理学著作,全书 42 章。在论述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的基础上,赞美了社会生活中的高尚品德和情操,向人们宣讲善和恶、荣誉和耻辱、正义和邪恶的概念。该译本的察合台文抄本很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办藏有一种,共 319 页。毛拉穆罕默德·铁木耳的另一译著《安瓦尔苏海里》仅标明写成时间和文种,即 1565 年用波斯文写成,未标明作者和写作地点。据推测,该书的作者就是安瓦尔苏海里。该书寓知识和哲理于通俗易懂的故事之中,用说故事的方式向人们传授科学知识和社会生活经验。毛拉穆罕默德·铁木耳于 1712 年将此书译成察合台文。

《尤素甫一佐来哈》原为阿不都拉赫曼·加米用波斯文创作的一部爱情长诗,描写一对青年恋人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和对自由的追求。1775 年叶尔羌维吾尔族诗人尤努斯将该作品译成维吾尔文。其译文不拘泥于原文的表达方式,对情节作了较大的改动,并且增加了一些章节。他将全诗分成 72 节,前 14 节阐述了自己对爱情、科学以及语言学的看法,后 58 节讲述尤素甫与佐来哈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大约在 20 世纪初期,哈萨克族著名诗人努素甫别克又将该诗译成哈萨克文,在北疆的伊犁、塔城、阿尔泰等地流传。

我国保存有大量的察合台文文献。现已有编目的有,1957 年新疆博物馆编《维吾尔古典文学抄本目录》(维吾尔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办编《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古籍名录》(维吾尔文)。仅后者就收录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办收藏的察合台文文献 1550 条。

我国目前已整理出版的察合台文文献主要有《阿布都热依木那扎里诗集》《两种语言之辩》《乐师传》《伊米德史》《和卓传》《翟里利诗集》《安宁史》《麦希吾尔诗集》《青吉斯传》《布格拉汗列王传》《先知传》《赛依德汗国历史资料》《戴赫仁乃扎提》《拜赫拉木古尔诗集》《伊斯坎德尔传》《众心所爱》《纳扎里诗集》《格则里》《拜亚孜》等。此外,维吾尔文版《源泉》杂志上也发表过许多察合台文文献的现代维吾尔文译文。除了上述已整理出版的文献外,我国学者特别是使用突厥语族语言民族的学者还发表了很多有关察合台文及其文献的论文。

Introduction of Turkish Language Documents

ZHANG Tie – shan

(Institute of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and Ancient Book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Being one of three Altai languages, the Turkic langu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Each ethnic groups using Turkic languages used old Turkic script, Sogdian script, old Uighur script, Mani script, Brāhmī script, Syriac script, Chagatai script in history. They used these languages to create, interpret and write down a lot of documents about politics, economics, history, geography, religion, language, literature, culture. These documents not only convey the Turkic nations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are the main resource to re-search the Turkic languages history.

Key words: Turkic language; old Turkic script; old Uighur script; old Chagatai script; document